

听读写记
学做问想

清大师娓娓道来
由历史细细说去

杜甫

李白

白居易

柳宗元

苏轼

中国大文豪

苏轼

王安石

屈原

韩愈
欧阳修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十大文豪

主编：童一秋

吉林文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姜 越
封面设计：永铭记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十大文豪/董一秋编.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4

ISBN 7—80626—872—3

I. 中... II. 董... III. 作家—列传—中国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9774 号

中国十大文豪

出版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印刷	北京通州鑫欣印刷厂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3.875
字数	1900 千字
版次	2004 年 2 月第 2 版

书号	ISBN 7—80626—872—3
定价	268.00 元（全十册）

导 言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生于北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1037），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去世，享年六十六岁。后谥文忠。苏轼与父洵、弟辙，同为北宋文学家，合称“三苏”。

苏轼自幼聪颖过人，“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及至成人，博通经史百家之学，“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亡兄子瞻墓志铭》）年方二十，游学成都，太守张方平以国士之礼相待。仁宗嘉祐元年（1056），苏洵携二子轼、辙赴京应试，深得文坛巨擘欧阳修赏识。翌年，兄弟二人同中进士。嘉祐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六年，以欧阳修荐，应试制策，除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英宗治平二年（1065），召试秘阁，得直史馆。父洵病逝，扶柩返乡。神宗熙宁二年（1069）还朝，以殿中丞判官告院。时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因政见不合，上书力陈其弊，得罪新党，出为杭州通判。后徙知密州、徐州、湖州。元丰二年（1079），御史李定等人摭拾其诗文中语，诬告苏轼讪谤朝廷，被逮入御史狱，史称“乌台诗案”。结案后，贬官黄州团练副使，筑室东坡，以诗酒自娱。哲宗即位，擢知登州。司马光柄政，召为礼部郎中，历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因不赞成尽废新法，反对以王安石配享神宗，遭到新、旧两党攻击。元祐四年（1089），以龙图阁学士出知杭州。赈饥治疫，疏浚西湖，修筑湖堤，民赖以安。六年，召为吏部尚书，改翰林承旨，知制造。复出知颍州、扬州。明年，迁兵部尚书，兼侍读。八年，任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哲宗亲政，起用新党，出知定州。其后连贬英州、惠州、儋州等地。徽宗即位，内迁廉州、永州，后复朝奉郎，提

举成都玉局观。建中靖国元年(1101)移居常州。同年七月二十八日,一代文豪苏轼在常州病逝。

苏轼一生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仕至从官,出长八州”,困于俗吏、屡遭贬谪,却从不随波逐流,趋炎附势。他的思想比较复杂,儒释道兼而有之。政治上从儒家仁民思想出发,主张革除弊政,整顿吏治,但对王安石变法基本持否定态度。在生活上则以佛老思想为主导,更多地采取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旷达态度。这种处世哲学是他身处逆境时自我排遣的精神支柱,也深深地渗透到他的文学作品中。

苏轼堪称中国文化史的千古奇才,他博学多识,才气横溢,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领域都有极高造诣。其文自然流畅,不拘一格,纵横恣肆,挥洒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其诗雄浑奔放,清新隽永,意境开阔,旨趣悠远,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超逸旷达,豪气四溢,婉柔韶秀,浑然天成,一洗五代宋初柔靡绮丽词风,开宋词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其书法长于行楷,飘逸洒脱,刚柔相济,与蔡襄、米芾、黄庭坚并称“宋四家”。其画力主神似,开宋代文人画之先河。不仅如此,苏轼对医学、养生学、水利、文物鉴赏、服饰、烹饪等均有独到研究。苏轼以天纵之才,执两宋文坛牛耳,其辉煌的文学成就,堪称集唐宋古文运动之大成。他的名篇佳作,不胜枚举,散文如《前、后赤壁赋》、《喜雨亭记》、《超然台记》、《放鹤亭记》、《文与可筧谷偃竹记》、《石钟山记》、《方山子传》、《潮州韩文公庙碑》、《上梅直讲书》、《答谢民师书》、《刑赏忠厚之至论》、《留侯论》、《贾谊论》、《日喻》、《文说》、《记承天寺夜游》等;诗歌如《和子由澠池怀旧》、《游金山寺》、《饮湖上初晴后雨》、《八月十五日看湖》、《题西林壁》、《新城道中》、《荔枝叹》、《闻捷》、《洗儿》、《惠崇春江晚景》等;词作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念奴娇·大江东去》、

《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等,上述作品都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历来为人们所喜爱、传诵。千载之下,展卷吟哦,他那豪放的文风,宏阔的意境、清新流畅的格调,挥洒自如的才情,独具魅力的艺术个性,仍不能不令人为之叹服。

苏轼一生著述宏富,主要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续集》十二卷,《奏议集》十五卷,《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十卷,《应诏集》十卷,《易传》九卷,《书传》十三卷,《论语说》五卷(已佚),《广成子解》一卷,《东坡志林》五卷,《仇池笔记》二卷。



苏轼肖像

目 录

导言	(1)
苏轼肖像	(4)
苏轼传	(1)
一、少年不凡	(3)
二、出蜀入京	(5)
三、汴京风云	(10)
四、宦游江湖	(13)
五、乌台诗案	(23)
六、被贬黄州	(27)
七、蒙召重用	(31)
八、四任知州	(34)
九、远放天涯	(38)
十、辉煌的文学成就	(42)
苏轼作品选	(55)
一、诗	(57)
二、赋	(102)
三、叙	(111)
四、记	(120)
五、传	(151)

六、论	(163)
七、志林	(222)

苏轼传

一、少年不凡

苏轼这个名字,在我国可以说是妇孺皆知。他不仅是一个大文学家,而且还是大书法家、画家。关于他的轶事流传甚多。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县人。他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照公历推算,是一〇三七年一月八日。

他出身于一个富有文学气氛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苏洵,字明允,因屡试落第,愤而烧毁自己的文章,再度悉心攻读,终于成为著名的古文家。哥哥景先,早卒。弟弟苏辙,字子由,是苏轼一生政治上和文学上的同道,两人感情十分深厚。由于父子三人的文学成就,并称“三苏”,又分别称为“老苏”、“大苏”、“小苏”。苏洵曾自称“布衣”,“堕在草野泥涂之中”苏轼也说“生于草茅尘土之中”,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堂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都反映出并非富有的中小地主之家的境况。

苏轼八岁时入乡校读书。老师是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他在近百个学生中独独赏识苏轼。苏轼对这位教了他三年的启蒙老师,直至晚年谪居海南岛时还梦见他。十岁时,改由母亲程氏讲授。十二岁时,苏洵从外地求宦游学返家,苏轼和九岁的苏辙便由父亲教授。一次,苏洵命他俩作《夏侯太初论》。夏侯玄(字太初)是三国时魏国的重臣。当时司马师继其父司马懿之后专权篡政,任大将军。夏侯玄参与了推翻司马师的密谋,事泄被捕。他临斩时,颜色不变,举动自若。据说他平日即处事镇静,一次“倚柱作书。时大寸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无变,书亦如故”。(《世说新语·雅量》)苏轼借以评论说:“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

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极力形容人们在有思想准备和无思想准备时表现的不同，推崇夏侯玄临危不惧的精神。这两句话，初次显露出苏轼随机生发、翻空出奇的雄辩才情，受到苏洵的称赞。苏轼成年后还把它用在他的《黠鼠赋》和《颜乐亭诗序》中。

幼年的苏轼不仅受到深厚的祖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而且也接受正统的儒家经世济时的政治理想的教育。他八岁开蒙的那年，即庆历三年（公元 1043 年），宋仁宗正锐意改革弊政，撤换吕夷简、夏竦等保守派大臣，起用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革新派人物，政局有所刷新。国子监直讲（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的官员）石介写《庆历圣德诗》加以颂扬。这首诗传到了四川，苏轼诵习之余，对韩、范、富、欧阳四位“人杰”十分仰慕。他的母亲程氏是一位有政治见解的妇女，有次她给苏轼讲《后汉书·范滂传》。东汉“名士”范滂反对宦官专权误国，汉灵帝建宁三年（公元 169 年）大逮捕党人，他镇静自若地前去投案，其母和他诀别说：“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程氏讲到这里，激动不已。苏轼问：“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程氏坚定地答道：“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苏轼十分感动，“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

苏轼正是怀着这样的政治抱负离蜀赴京，找寻出路的。

二、出蜀入京

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三月,苏轼兄弟随父离家,从陆路自阆中(今四川阆中)、度秦岭,经关中,最后于五月到达汴京。

八月,苏轼与苏辙在开封府考进士,同时获选。按照宋朝的规定,府试以后还要经过中央礼部(负责礼仪、祭享、贡举等事)的考试和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兄弟俩住在兴国寺准备应考,苏洵则投书欧阳修、富弼、韩琦等人,受到他们的重视。第二年正月,欧阳修以礼部侍郎(礼部的最高长官)、翰林侍读学士(给皇帝讲书的侍从官)知贡举。他对当时流行的奇诡艰涩的文风深为不满,把平易流畅的文风作为取士的标准。苏轼的考卷《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他的特别赞赏。据说欧阳修读了他的文章后说:“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经过仁宗的“御嗽”,苏轼赐进士及第,苏辙赐同进士及第。宋仁宗高兴地对他的皇后说:我为子孙得了两个宰相。

不料程氏在家病逝,苏洵父子只好回蜀奔丧。在封建时代,父母或祖父母死去,子孙辈必须谢绝人事应酬,如果是做官的人,还需解除职务,在家守孝二十七个月,叫做守制或丁忧。苏轼便丁忧家居。

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十月,父子三人再度赴京。这次是走水路。他们经现在四川境内的嘉州(治所在今乐山)、泸州(治所在今泸州)、渝州(治所在今重庆)、涪州(治所在今涪陵)、忠州(治所在今忠县)、夔州(治所在今奉节),出三峡,到了江陵(今湖北江陵),已是岁末。一路上,碧波滔滔的长江,秀丽多姿的巫山,忠州的屈原塔,夔州的八阵图,其他如神女庙、昭君村、黄牛庙、虾蟆碚

等山川文物、名胜古迹，处处震荡着他们的襟怀，激发起他们的才思，他们写下了不少作品。江陵以后的路程，将改由陆路北上。为了纪念这次舟行，他们就把三人途中所作诗文一百首，编为《南行集》。其中有苏轼诗四十首，这是现存苏诗中的最早一批作品，可以看作他诗歌创作的起点。这些作品初步显示了苏轼的政治抱负和诗歌才能。

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二月，苏轼到达汴京。礼部授予他以河南府福昌县(今河南宜阳县西)主簿的官职，办理文书等事务。但他并没有去赴任，而是与苏辙一起准备“制科”的考试。原来唐宋时除了“进士”、“明经”一类“常举”以外，还有一种皇帝特别下诏举行的考试，叫做“制科”。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八月，苏轼以“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考入第三等(为“上考”)，这是极大的荣誉。从宋初以来，被取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他两人。考试毕，他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治所在今陕西凤翔)签判的官职。苏辙考入第四等，被任为商州(治所在今陕西商县)推官(州的属官，掌管审案)；但因苏洵奉命在京修礼书，他奏请留京侍奉父亲。他送哥哥赴任，到郑州分手。

兄弟俩第一次离别，情绪不免感伤。唐代韦应物在《示全真元常》一诗中有“宁知风雪夜，复此对床眠”的名句，意思说，今夜雨雪对床畅谈，极惬人意，以后哪一天复能如此？苏轼回忆往昔兄弟俩同读此诗，感触很深，曾约定日后一起退隐，纵情山水。想到这里，觉得高官厚禄并不值得追逐。

但是，北宋初年积贫积弱的社会局势唤起他平素怀抱的济世之志，逼着他睁开眼睛正视现实。宋朝是比以往几个统一王朝更注重中央集权的朝代，它把军权、政权、财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皇帝手中，这是宋代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当时官僚机构庞大臃肿，腐败无能；在财权集中方面，规定地方财赋绝大多数上交中央，又刺激了上层统治集团的穷奢极欲，挥霍享乐，到宋仁宗时，国库空

虚,“惟存空薄”。这使固有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开国不过三十多年,宋太宗时就爆发了王小波、李顺的农民起义,人数达数十万,就是突出的例证。宋朝缺乏抵御外来侵扰的能力,一直处在周围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之中,每年向辽、夏输纳大量“岁币”(银、绢),给财政造成沉重负担。

正是在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有些改革家就出来主张“变法”,要求革除弊政,缓和危机,形成了变法运动。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全国军事机关的副长官),要他们提出改革方案。范仲淹就提出“明黜陟”、“厚农桑”、“修武备”等“十事”。宋仁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并颁行全国,号为“庆历新政”。但事隔不久,就因保守派的反对而失败,范、富罢职,韩琦被迫出赴外任。

“庆历新政”的失败更促使社会矛盾的急剧发展。封建士大夫中仍然酝酿着新的改革浪潮,一些局部性质的改革活动也在渐次展开。这是王安石变法前的酝酿期。苏轼这时的基本政治倾向是要求变法。他写了不少政论文,从要求革新的政治理想出发,继承汉代贾谊、唐代陆贽的政论精神,结合历史经验教训,分析当前形势,研究治国之策。代表作就是考“制科”时所写的《进策》(包括总论性质的《策略》五篇、讲具体改革措施的《策别》十七篇、讲辽和夏问题的《策断》三篇)和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在凤翔任上所作的《思治论》。

这些政论文在风上深受战国时代纵横家的影响。它的特色是汪洋恣肆,辩才无碍。宋人李涂《文章精义》指出,苏轼上述《策略》等“论利害”的政论,学之于《战国策》;并说,“苏门文字,到底脱不得纵横气习”,是正确的。它常被旧时代的举子们奉为楷式。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曾记当时俗语说:“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苏轼这类文章的影响。

这一时期是苏轼诗歌创作的初步活跃时期。和政治上主张改革相一致,他的作品中也以关心国事、反映民生疾苦为重要主题。他经常作贫富悬殊的对比:“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闲时尚以蚕为市,恐忘辛苦逐欣欢。”(《和子由蚕市》)同是“蜀人”,若乐如此不均。这个对比正说明作者对封建社会中贫富对立的现象有着较深的感受。

天寒降雪,他叹道:“有客独苦吟,清夜默自课。诗人例穷蹇,秀句出寒饿。何当暴雪霜,庶以蹶郊贺!”

他还写了一些指斥时弊的诗。如咏史诗《郾坞》,借古喻今,语多讥刺:

衣中甲厚行何惧,坞里金多退足凭。毕竟“英雄”谁得似?脐脂自照不须灯。

这首诗是嘲骂汉末董卓的。董卓是个奸相,怕人行刺,在衣内加了厚甲,自以为可以确保生命安全;他把民脂民膏搜聚在他所盘据的郾坞,扬言“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然而,他后来失败了,被暴尸长安,时遇酷暑,肥胖的躯体流脂满地,人们对他恨之入骨,就在他的肚脐眼装上灯蕊,象点灯似的烧了几夭。诗的后两句说:照明不须灯,真算个“英雄”!嬉笑怒骂,鞭挞有力。这时当时疯狂地聚敛民财的官僚贵族,无疑是个严重的警告。陈师道曾说:“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后山诗话》),是不错的。

苏轼这时期的诗在艺术上也趋于成熟。组诗《凤翔八观》八首就代表他当时五七言古诗的成就。凤翔是有名的古都,文物很多,秦刻的“石鼓”,秦碑“诅楚文”,王维、吴道子画的竹和佛像,唐代著名雕刻家杨惠之所塑的维摩像,东湖,真兴寺阁,李氏园,秦穆公墓,被称为“凤翔八观”,苏轼都一一加以吟诵。尤如《石鼓歌》,从“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开始,写他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冬,初到凤翔任,即去孔庙谒圣,见到石鼓;然后详细描写石鼓的文字和经历,最后以“兴亡百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细